

城西区文史资料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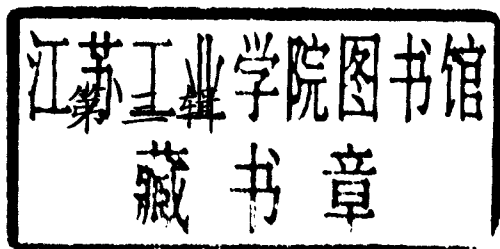


西宁市城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世锦兄存照：

老友 生祥 2005.12.18

城西区文史资料



西宁市城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5 年 11 月

主 编 王福邦

责任编辑 熊进邦

编 辑 谢金莲 赵仰仑

罗 麟

目 录

逝去的岁月	赵仰仑 (1)
青海汉族祖根渊源考	谢 佐 (58)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朵黎华 (70)
青海河湟地区春节习俗	张维珊 (78)
清明·春社·天赦	田 川 (92)
西宁面食录	巢生祥 (96)
忆五十年代中学假期生活	蔡成瑛 (120)
登上虎台话虎台	杨 柳 张政成 (125)
古城台命名的由来	刘秉德 (131)
国立西宁师范	童生盛 李逢春 (136)
青海古代几个郡县治的位置	刘秉德 (145)
石殿峰创作的四季歌与五更调	罗 麟 石其麟 (155)
回味往事	李仲连 (159)
湟川中学片断回忆	石其麟 (167)

逝去的岁月

——八宝农场“脱胎换骨”纪实

赵 仰 仑

引 言

从1958年至1962年我被送往祁连八宝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日日夜夜，迄今依然在恶梦中出现，想忘也忘不掉。纪伯伦曾经说过：“与你一起笑过的人，你可能将他忘记，与你一起哭过的人，必将终身难忘”（《隐居的先知》），的确如此，那里的人和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因为那里的人，与我同样承受过山一样厚重的压力，忍受过残酷的磨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搏浪，有过同样苦难的命运。

最近城西政协的同志约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后人。我便欣然答应了。我被“打成”右派，只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被错误处理的时间竟然长达22年。在历史的长河中，22年也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确是占去一半以上的青春年华。

不求符合时尚，只求去伪存真，是我撰写史料的原则，因为真情实话才是砌成真理金字塔的基石，而那些假凤虚凰形成的文字，哪怕装满一车皮，也不会包含一丝的真理基因。

悠忽之间，我已年逾古稀，岁月催人竟是如此无情。他像流水一样快，一样不停顿，一样了无踪影，但是，岁月不该像流水一样东逝，对于灾难的历史，不能忘记，不能遮掩，也不能佯装不知。岁月也不会真正的逝去，而是悄悄的躲在人们心理，偷偷的改变着自己，但愿岁月能够擦掉昨日的忧伤，给人们希望，在我们今后的岁月中，不再有梦里的惊惶。

一、为囚之路

1957年底，我被错划为右派（详见《青海省文史资料集萃》建国后卷373页（〈逝去的岁月〉）。次年3月23日，原工作组组长来校，传达上面对我的处分决定：“保留公民权，开除送劳教”，我问他“多长时间？”他回答：“三至六个月”。他不许本人申辩，我只能随他前往西宁西郊彭家寨劳教所，管教人员将我带进北面的一排平房，靠最东头的一间房子，里面有两处通间土炕，炕上坐满了人，管教员命令他们“再往里挤挤”我被挤在炕沿边上，我问旁边的人：“贵姓，是哪个单位的？”他向我“嘘”了一声，左右看了看，然后小声说“这里不允许交头接耳，不准与人来往，不能问案情……”一连串的“不许”和“不准”，可是晚上他还是偷偷告诉我：他姓张，是地质队来的，因为说过“赫鲁晓夫的头光光的，像个滑头”而被打成右派，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在这里谁敢笑，这位老兄比我早进来一天，但是已经学会了一连串的“不许”和“不准”，看来“改造”还是有收获，我还得向他学习。

我进去不到一小时，又进来一位东北口音的人，一进门

就大骂：“这是什么鬼地方，我们单位的领导真是一帮大混蛋，硬说我是右派，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他们不得好死……”从他的骂声中我已了解到他是交通部门送来的，对于这位东北汉子的大骂，周围的人既不去制止，也不去理睬，都默默地，面部毫无表情地各想各的心事，其实这是无言的理解和支持，这可能是由于管教干部不在场的缘故吧。

晚饭后，管教干部让在押的全部犯人集合，点名训话，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我们有名但并不叫名字而是叫号：“一号”，“二号”……我可能是倒数第三号，他的训话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有时还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们的良知，他说：“父母把你们拉大容易吗？你们却搞偷盗、打架、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搞右派反革命活动，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对得起谁？”他罗列的这些罪名，没有一条能与我沾上边，可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听，从这时起，我开始训练听力与中枢神经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安之，之后的管教干部训话，大致都是沿用这一格式，我也只能采用这一不变的对策。此时我偷看周围，没有一个熟识的人，干部训话最后，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省委非常关心你们的改造，为你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改造地点，那里有山有水，山清水秀，明天早晨就要出发，希望你们在那里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最后的这段话，倒还引起了我的一点注意，但他并未说明天究竟出发到哪里？去多长时间？我虽然“保留公民权”，可这一切依然对我保密。

晚上，我挤在这间只有 10 平方米却安排了十多人的号子里一夜未眠，父亲因为我的“问题”被牵连送去劳改，家

中留下年迈的老母和正在上学的爱人和两个妹妹，她们该如何度日？她们能否把这苦难的路走到头，真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里才是苦难乐章的终止……一想到此，如乱箭穿心，我真想歇斯底里的大喊几声，又想大哭一场，但是又怕惊动同号，惹出新的麻烦，只好强压心头的焦躁，其实老母和家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比我更大。

次日早晨，即1958年3月24日早晨，正值早春二月，青海的冰河尚未解冻，囚车载着我们离开彭家寨东行，经过西宁市区时，人们还在睡梦中，此时的母亲定是一夜未眠，整整哭了一夜，她怎么能想通家中所突然遭遇的灾难，她也根本不理解说话也会犯罪。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母亲啊多保重，你一定要等儿子回来，你的儿子一定会回来”。

囚车一直东行，车上的同类猜测可能是去黑龙江，因为那里“有山有水”，但是到了河口囚车又改向西行，同类又猜测，肯定是去新疆，因为那里也“有山有水”，“是个改造的好地方”。有的发牢骚“古代发配还告知发配到哪里，如今就不同了”。“发配？发配还得脸上刺字，向你就得在脸上刺上‘老右’二字，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立即有人反驳。车上气氛反倒活跃了一点，第一天晚上住在张掖，第二天车又改向南行，晚上住民乐，第三天囚车通过扁都口，翻过祁连山，扁都口自古是西宁至张掖的通道，汉代霍去病，隋代隋炀帝以及后来的法显和尚都曾走过这条路，不过他们都是由南向北走，二十二年前，马步芳的军队押着被俘的红军战士就是从这条路走向西宁的，这些红军战士大部分遭到残杀，如今这条路依然很不好走，两边是雄伟的祁连山，山上

挂着白雪，空中盘旋着秃鹫，涧底是童子坝河，公路经常被河水冲断，我们边修路边前进，整整走了一天，第四天晚上住在俄堡镇，此镇为祁连山南麓古镇，位于宁张公路与俄祁公路的交汇处，早在元代元世祖至元年间，就建有城堡，称博望城。

到了俄堡（亦称俄博），大家心里已经猜出八九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祁连县八宝农场。

祁连县属海北藏族自治州所辖，地处西宁西北约 600 里，中间隔有达坂山，海拔 4700 多米，常年积雪，此时正是厚雪封山的季节，万一翻了车，满车老右倒不要紧，但车上还有押解犯人的人民，这便是当时绕道河西走廊的缘故。

二、祁连山八宝农场

祁连县平均海拔在 3000 米至 5000 米之间，全年无霜期仅为 101 天，1944 年才建立县治，全县人口不足 8000 人，境内山峦纵横，高寒缺氧，在崎岖的山路上，偶尔可以见到一些羊群，有一条简易的沙石路，沿着八宝河由俄博延伸到祁连县城——八宝镇，当时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经常有恶狼和其他野兽出没，在这里不需要修筑岗楼，也不需要拉铁丝网，即使将犯人放开，也很难找到活路，不是被冻死饿死，也会被恶狼吞食，因此，是一处理想的流放和改造的地方。

反右刚开始，青海省委就决定预先在此建立“八宝农场”作为专为右派“脱胎换骨”之地，为了对外保密，邮件一律不写场名，只写“002 号信箱”。“八宝”一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这里盛产鹿茸、麝香、蘑菇、大黄、金、银、铜、铁八样宝贝而得名，二是藏语“八本”（即森林之

野
比
人
林
子
要

意)的译音。八宝滩南有牛心山(高4667米),北为酥油大阪(高4776米)面积约6.4平方公里,在祁连县城八宝镇以东约四五里路。八宝农场下设鸽子洞、棉纱湾、夏塘台、青杨沟、红崖湾、扎马什克等多处农业队和铜矿、石棉矿、煤矿等工业队以及畜牧队、狩猎、捕鱼队,在阿里克还设有分厂,下属八九个农业队,厂部还设有文工团、卫生院等等机构,全场有近万名犯人,(也有人说近两万人),大都是反右后期从省内各单位学校陆续送来的一批批“右派分子”。1958年春夏之交,又从陕西押解来一批社会盲流、无业者、还从上海、广州等地送来一批所谓历史有问题,又不够资格判刑的人和一些不太听话又无重大过错的年轻人,八宝农场的人,大大超过了祁连全县的原有人口。八宝农场为右派改造提供了场地,反右运动为八宝农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廉价劳动力,边远的祁连县也因八宝农场的兴建而轰然出名,八宝农场的名字与青海的反右运动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虔诚的改造

1. 初到夏塘

离开西宁的第五天早晨,汽车载着我们沿着八宝河东行。八宝河为黑河东岔,源出金羊岭西麓,上游称俄堡河,下游称八宝河,流程为108.5公里,由东向西流经俄堡、阿柔(阿里克)、八宝三乡,至狼舌头(黄藏寺所在地)与黑河相汇转向北流入张掖。汽车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很少看到行人。下午,我们到达八宝农场场部所在地八宝滩,押解我们去场部办理手续,我们静静地坐在汽车里面听候命运的安排,偷偷地观察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八宝滩原本是一处偏僻的山洼，可如今已变成了闹市，被改造的人像蚂蚁一样在地上忙碌着，开山打钎声、抬石打夯声、劳动号子声、隆隆鞭炮声不绝于耳，这里的人头上顶着破帽，腰里系着麻绳，虽然早春寒风袭人，冰河尚未解冻，可他们有的却光着膀子赤着脚，他们背上背着“黑色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的“紧箍咒”，身上抬着超过人体负荷的木材、石料，面部毫无表情，嘴里却还哼着抒情而豪迈的曲子，表达着他们改造的虔诚，啊！这就是我将承受的生活，在匆忙的人群里，我第一个认出的人是原西宁一中校长马天明，他提着两只水壶向南面山坡去送水，我还看出原教育厅干部王世俊，正泡在八宝河里向岸边捞石块，记得这位老兄在1949年刚解放后的教师训练班上训斥教师的时候，极尽挖苦讽刺的能事，当时老师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狼人”后来听说他因哥哥曾任“戡乱大队长”而被捕，但其兄又已去了台湾，无法调查落实，所以一直未判又未放，今天不知为何又到此地。

八宝农场场部设在八宝河北岸拉洞台下，只有几排极其简陋的平房，这点平房也全是右派自己设计、烧灰、打土坯盖的，初到这里的右派就住在帐篷或山洞里，晚上蛇钻进被窝，瞎熊摸进伙房的事经常发生。如今住进平房，已经是安全多了。八宝河上架起了简易的木桥，也是右派设计建造的，卫生院的医生护士，文工团的演员全由右派担任，当地老乡反映，“右派真能”“右派”反倒成了能人的代名词。

约半个小时，押解我们的人从场部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车后，这个干部像点小猪似的清点了一下人数，然后向大家说“你们谁会骑马？”有几个人举手，

这几个人被留下，估计是分往畜牧队，我们继续向西行驶，经过八宝镇、棉纱湾、鸽子洞，渡过扎马什河，汽车爬上了一个斜坡，老远看见几处破旧的民房，这便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终点——夏塘台。

夏塘台三面环山，东面是扎马什河，北面是祁连山，西面和南面全是大雪山，山坡上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北面祁连山下是黄藏寺，寺前是黑河，与夏塘台隔岸相望，寺的旁边是狼舌头，它真像一只饿狼，朝夕监视着我们，一有机会就会把你吞噬掉，这里是八宝河、黑河、扎马什河交汇处，我们不是来旅游，不会有导游介绍，这许多名称，只是在以后的交谈中才逐渐了解的，可能有误。

初到夏塘，已是夜色降临，我们草草吃了点东西，便被带领着爬过南面的山沟，又爬上陡坡，来到一处牛圈，里面没有灯光，只有牛粪的臭味，我们躺在潮湿而冰冷的地上，很快就入睡了，因为连续五天的跋涉，实在太累了。

次日，我们又从牛圈返回夏塘台，住进一处旧庙的大殿里，四五十人挤在一起，但比起昨夜的牛圈，这里已是天堂了，本来天堂与地狱是相对存在的，没有地狱就不会有天堂。

队长第一天的训话除了继续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还透露了令人震惊的信息：他说：“上面决定今冬明春要摘掉你们当中百分之五到十的人的右派帽子，并解除这些人的劳教处分，希望你们积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十分纳闷，工作组长对我传达处分决定时，不是明确告诉我处分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为什么今天又变为“今冬明春”而且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到十呢”？果真按此比例，这些人需要

十到二十年才能全部回到人民当中去，能否活着出去还是问题，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抱着坚定的改造意志，争取首先进入这“百分之五到十”的行列。

一开始，我被分配到夏塘南面的山坡上去挖水渠，冻土坚硬如铁，一镐下去，只会出现一个小白点，我们只好用钢钎铁锤去揭开冰盖，虎口被震裂了，满手是血泡，但无人叫苦，在晚上的改造学习会上各个神态严肃的表示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右派反动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去，这种感情不是虚伪、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是表达对改造的虔诚，但可悲的是：即使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监督改造的人用“一抓就灵”的法宝一衡量，依然认为你的虔诚有假，要想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表扬比登天还要难。

挖渠的第二天，我亲眼看见有名老右从山坡底下的小河边烧好开水，刚走了几步，一块冻土，从山坡滚下，正好砸在他的头上，这名老右当场被砸死，“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有人尖叫，有人哀叹，工地上一片喧哗，队长却说：“死就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继续干活”大家只好低下头，继续抡自己的十字镐，这名老右被埋在山下，至今不知他姓甚名谁。过了两天，听说又有一名老右吊死在夏塘台北面的小树林里，队长在训话时说：“他是抗拒改造，是自绝于人民，他是把右派帽子戴进棺材”，他死了之后，究竟有无棺材，至今依然不知。自此以后，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只觉得死一个右派就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八宝农场，由于劳动工地分散，监管人员毕竟少于被改造的人，所以彭家寨所规定的一系列“不准”，逐渐失去效应，相识的老右之间，开始可以打招呼，接着可以问声：

“家里来信了吗？外面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在夏塘台遇到的旧相识有：青师一附小校长薛秀贤，老同学赵存璧、青师教师郑行键、师大教师陈希夷、还有原实验小学教师赵世铎等，他们都来得比我早，其中赵世铎思想负担似乎很重，身体也比较差，大家见面偷偷说上两句安慰的话，心情觉得稍好一些，一天，郑行键偷偷拉我到一处断墙背后，从随身带的背包里很神秘地拿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有多半瓶油泼辣子，说是他爱人从西宁给他邮寄来的，让我挑点放在菜里，多么来之不易的情谊啊，时隔半个世纪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含着泪水品尝这一筷头美味的。还有一次是在吃午饭时，我偶然遇到原市委文教部的小吴也在夏塘台，记得反右当中，他还叼着烟斗躺在我的床上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好好交待问题，他说：“不管你有无右派言论，文教部早已划定你是右派，要不然，为什么运动一开始，上面就给实验小学派工作组呢”？他说的倒是实话，但是使我不解的是既然上面早已划定，又何必兴师动众搞群众揭发呢，这不是先做结论后定罪，然后寻找论据编造罪行吗？据小吴说他是由于别人叫他“吴部长”他没有及时辩解而被送到这里的，当时文教部长吴宝山，也是学校反右学习总负责，这位小吴竟敢冒充“吴部长”，难怪被送来改造。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青海省委书记高峰亲自来到八宝农场“看望”我们这些“右派”，他说：“同志们，党并没有忘记你们，大跃进需要大量人才，可是

你们尚未改造好，应该加速改造……”对“老右”称“同志”，使大家感到吃惊，在下面纷纷议论，是不是书记口误，还是真的“立场”有问题？祁连县委书记史克敏也来到夏塘台，提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史克敏在西宁解放初是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干部，在1949年的教师学习会上，我们曾朝夕相处。以后他又调团省工委，我们有过多次联系，如今他在台上，我倒成了阶下囚，相见不敢相认，只是惊异地注视几秒钟，很快将视线转移，他不敢称我们为“同志”我们十分理解他的恐惧心理。

上级领导突如其来的“慰问”，给八宝农场的大跃进加了油，讨论会上老右们热泪盈眶，纷纷慷慨陈词，有的甚至咬破手指，以血书请缨，表示自己改造的虔诚，自此人们好像发疯似的拼命大干，挑灯夜战，白天黑夜连轴转，成了家常便饭。

2. 上山打柴

这一阶段，我曾被抽调出来上山打柴，保证供应伙房的燃料，每天早晨带上斧锯麻绳和干粮，离开夏塘，涉过深沟，爬上山坡进入原始森林，选定一两株枯树锯倒，然后每人一段，背到伙房，劈成木块，垛好，就算完成了任务。与我一起上山打柴的有公安厅的王玉阁，电影队的阴润生，还有一位姓周的上海人，胖子，是商业上来的，还有三四位已记不清姓名，一共有七八人，大家在一起相处很好。

上山的路线，返回的时间都由自己确定，此时正是夏秋之交，大自然是没有界限的，他赐给我们的同样是盎然生机。森林里野花盛开，花香鸟语，绿草如茵，空气十分清新，兰马鸡、小麋鹿、经常从你面前飞驰而过、小松鼠、小

旱獭、跳来跳去，似乎十分友好，进入森林，犹如来到童话世界，摆脱了人世间一切烦恼，有时大家躺在如茵的草地上唱支山歌或者说说笑话，甚至谈谈心事，倒也自在。山路不仅崎岖，而且又陡又滑，我们在下山的路上经常被滑倒，前面的刚倒下，后面的笑声未止又滑倒了，于是有的同类就开玩笑说：“我滑倒了你莫笑，小心你也要滑倒。”这句话倒是反映了人人自危的年代里的真实情况，前面提到的文教部的小吴就是例子，在小吴来八宝之后不久，听说老吴也被打成“右倾”，送往玉树改造。

3. 脱胎换骨初见成效

一天、我打柴回去，听说场部派文工团来慰问演出，此时我已无心看演出，一人在伙房门口劈柴，文工团有几个熟人就跑到伙房门口来看我，其中有一中教师马绍麟，老同学余存邦，还有实验小学教师赵春晓、王华蕴，这两位都是由于同情我而被划为右派的（当然还编造有其他罪名），还有一位是原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谢士英的女儿谢娜玲，他们一齐围着我看我劈柴，就像围着动物园的笼子看狗熊一样，我们相互没有什么交流，更不敢说什么“慰问”的话，但是我们心照不宣，各有各的酸楚，他们看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位女声说：“唉哟，劲儿大呗”，便又一起无声地离去，他们走后，我在想：虔诚的改造使我的体力增强了，这可是一大收获，我自感欣慰。

时间不长，我又被当作“强劳力”抽出去背矿石，之后又被驱赶着到香子沟炼铁、到照壁山挖煤、到萨拉河炼焦。在背矿石的路上，一位与我同路自称是人民银行的同类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实验小学。”他又惊奇的问“啊！

我的孩子就在实验小学上学，听说你们的赵校长也被送到八宝来了，是吗？”我说：“是的，你认识他吗？”他说：“岂止认识，我们很熟，我听过他在家长会上的讲话，也和他多次交谈过，挺干练，挺负责，家长们都说他是个好人。”我说：“好人？好人还送到八宝来改造？”他叹口气说：“这里来的不一定是坏人，依我看，大部分是被冤枉的，迟早是要平反的。”我佩服他的大胆，但我又怀疑他的眼力，既然“很熟”，为什么当面不认识呢？也许劳动改造真有使人“脱胎换骨”的神力，我已经是半年多不照镜子了，真不知自己已经换成什么鬼模样了？我为自己脱胎换骨初见成效感到欣慰。

4. 牧民口中有真理

在香子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与一位朴实牧民的对谈，一天傍晚收工后，我和另一同类被留在工地收拾工具，返回时天快黑了，遇见一位披着破皮袄，带着毡帽的牧民坐在牛车上与我们同路，他见我们走得很累，就主动招呼我们坐上他的牛车，走了一段路，问我俩：“你们是右派吗？”“是的”“右派就是说共产党不好的人是不是？”我俩相互看了看，立刻辩解：“我们从来未说过共产党不好，只是给个别党员领导提了意见。”“提意见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听，我们从不给领导提意见。”接着他给老牛加了一鞭，牛车人仍缓慢地行驶在雪地上，我们默默无语，此时我回忆起在师范学校读过的一篇课文《说难》，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不料韩非的